

# 当代哈萨克精英与社会转型

纳扎尔拜·叶尔肯

**【内容提要】** 本文以哈萨克政治中的精英为研究对象，以历史脉络为线索，对哈萨克精英的形成过程、组成方式等进行分析，并探讨哈萨克社会转型与精英变迁之间的关系。在哈萨克汗国成立至今的五百多年间，哈萨克社会经历了两轮根本性的政治和社会转型，即苏维埃时期的社会主义化与独立后的资本主义化。而哈萨克精英则在此转型过程当中经历了三轮演变、两轮危机与一轮重组。每轮精英演变都是在外部环境错综复杂的情况下进行的，其核心议题与推动力是化解外部威胁与团结内部力量。由于哈萨克斯坦位于欧亚大陆中心地带，与东方和西方都具有深远的历史、精神和经济联系，因此该国境内的任何地缘政治博弈均会波及周边地区，加剧地区地缘政治风险。而在此过程当中，虽然哈萨克精英在形塑国家发展方面发挥着格外重要的作用，但外部安全环境的变化及其由此产生的政治压力始终影响着哈萨克精英的政治选项与发展方向。

**【关键词】** 哈萨克精英 社会转型 地缘政治 区域合作

**【作者简介】** 纳扎尔拜·叶尔肯，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孔子新汉学计划）哈萨克斯坦籍博士研究生。

## 导 言

本文探讨的是当代哈萨克精英与社会转型的关系问题。社会转型是指社会结构的改变过程。转型不仅是社会变革的重要形式，也是社会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反映着社会发展历程的阶段性特征。19世纪20年代初至60年代末沙皇俄国的殖民入侵与吞并，20世纪初期俄国境内所发生的一系列革命与改革，30年代的“大清洗”，以及80~90年代的苏联剧变及其解体，极大地改变了包括哈萨克斯坦在内的整个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不难发现，推动哈萨克

社会转型的动力主要源自外部安全环境的巨大变化及其所产生的政治压力。而在此过程中哈萨克精英在应对危机与适应新环境等方面独具一格，其信念与行为始终以民族独立与和谐统一为核心，主导着社会价值观的变化与国家发展方向。在被沙俄殖民至苏联解体及宣布独立后至今的近 150 余年的社会转型实践中，哈萨克精英尤其是政治精英，在民族塑造、维护权益、争取独立及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与制度设计上的博弈和互动，对哈萨克斯坦的政治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与东欧及其他中亚国家的转型进程相比，哈萨克斯坦的社会转型具有更为复杂的特性。19 世纪，沙皇俄国为了更加有效地控制哈萨克草原，分别于 1822 年和 1824 年颁布实施《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条例》<sup>①</sup>与《奥伦堡吉尔吉斯人条例》<sup>②</sup>，从此哈萨克汗国<sup>③</sup>正式覆灭，原有的可汗制被废除，整个区域按照沙俄政治制度被划分为若干行政区，由沙俄政府所派遣的官员治理。与此同时，地方哈萨克封建精英丧失了绝对权力，世代相传的政治垄断地位被打破，地区影响力被大大削弱，哈萨克近代社会政治转型拉开了序幕。

忧患意识始终是社会变革的催化剂。面对由战败所引发的国内混乱局势，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通过签署《整顿国家秩序宣言》<sup>④</sup>，实施君主立宪制，组建国家杜马，改变了俄国的政治社会结构与发展方向。此时，各种政治力量顺势纷纷组建政党，各地精英开始踊跃参与国家的新政治进程，地方与中央间的关系逐步从之前的绝对依从转变为相互依存。而这一时期的政治变革则为哈萨克精英敞开了改变其民族命运的大门，提供了表达利益诉求与实现政治抱负的平台，开启了全面现代化的新进程。面对史无前例的机会，置身于国家杜马与地方各阶层的哈

① 《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条例（Устав о Сибирских Киргизах）》是由时任沙俄西伯利亚总督斯佩兰斯基伯爵（М. М. Сперанский）提出，随后由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签署颁布。该条例的基本政治含义在于废除哈萨克中玉兹汗国的政治统治，按照沙俄本土制度进行制度改革，其领土并入新成立的西西伯利亚总督（Западно-Сибирское генерал-губернаторство）管辖。

② 《奥伦堡吉尔吉斯人条例（Устав о Оренбургских Киргизах）》是由时任沙俄奥伦堡总督埃森伯爵（П. К. Эссен）提出，最终由沙俄亚洲事务委员会（Азиа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审议通过。该条例的基本政治含义在于废除哈萨克小玉兹汗国的政治统治，按照沙俄本土制度进行制度改革，其领土并入奥伦堡总督（Оренбург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管辖。

③ 哈萨克汗国（1465~1847）由白帐汗国兀鲁斯汗后裔克烈（Керей）与贾尼别克（Жәнібек）苏丹联手所建，共历经 19 位汗王。

④ 《整顿国家秩序宣言（Об у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ван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порядка）》是由沙皇尼古拉二世于 1905 年 10 月 17 日签署。该宣言赋予人民不可剥夺的公民自由权，允许言论自由与集会自由，并且将国家杜马的大门向境内其他族裔人士敞开，承认国家杜马是国家立法机构，未经通过的法案不具备法律效力。对此，时任杜马议员、阿拉什运动领导人阿里汗·布克伊哈诺夫（Әлихан Нұрмұхамедұлы Бөкейхан）的评价是“1905 年的俄罗斯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成为了真正的欧洲国家”。

萨克精英主动采取措施，应对百年一遇的地缘政治变动和挑战，陆续返乡组建民族政党，召开全国民族代表大会，宣布成立民族自治政府<sup>①</sup>。与以往不同，此次哈萨克精英的根本目的在于建立独立自主的政权，并且以此为基础推动哈萨克社会的民主化、法治化与现代化。

俄国二月革命点燃了哈萨克民族解放运动的火种，为哈萨克精英指明了发展方向，也为其维护民族独立与唤醒民众带来了希望。可是，十月革命的爆发以及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与白军的节节败退，则扑灭了由哈萨克精英主导的独立之焰。苏俄军队占领哈萨克全境之后强行解散了当地的民族自治政府，民族独立运动因此遭到毁灭性打击，但却未能熄灭哈萨克精英心中的希望之火，直至“大清洗运动”为止。这场20世纪首次由哈萨克精英、俄国新旧精英集团所主导的政治博弈证明，哈萨克社会的转型方向与进程取决于外部安全环境的变化及其随之所产生的政治压力。

苏联时期的“大清洗运动”也波及哈萨克。数以万计的人死于“大清洗”，许多人被关押、拷打或者送入劳改营，而作为社会顶梁柱的哈萨克精英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迫害。哈萨克社会完全按照莫斯科的规划发展，呈现出大规模俄罗斯化及与传统政治文化断裂的趋势。不难看出，20世纪中叶的新一代哈萨克精英在莫斯科统治集团的全面安排和监督下得到教育与培养，通过干部职务名册表制度，在“金字塔式”的精英上升渠道中得以提拔，依靠个人忠诚与治理能力迈入权力核心。伴随勃列日涅夫的上台与执政，哈萨克新一代精英开始重掌地方权力，但在戈尔巴乔夫时期遭遇由最高权力核心更替与政治改革所引发的危机。苏联解体前夕，由于戈尔巴乔夫推行“民主化”和“公开性”，苏联最高权力机关首次引入公开竞争与差额选举的干部任用制度，在打破旧制度的同时再次开启了包括哈萨克在内的新一轮政治转型的序幕。

在苏联解体与哈萨克斯坦宣布独立的过程当中，哈萨克社会迅速完成了由一党制的苏维埃体制向多党制的宪政制度的转变，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多元的市场经济的转变，同时也完成了由苏联境内的一级行政区向一个独立民族国家的转变，而这些转变都是由哈萨克地方精英与莫斯科中央精英间紧密互动，通过自上而下的激进变革方式在短期内实现的。哈萨克社会转型的这一特

<sup>①</sup> 阿拉什奥尔达（Алаш Орда）成立于1917年12月13日，是继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之后，由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联手创建的自治政府。浩罕自治共和国成立于1917年11月28日，由居住在中亚两河流域（河中地区）的穆斯林族群所建。

点也形成了新一轮政治现实，即苏联时期的大部分政治精英在哈萨克斯坦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并未消失，而是按照新的精英生成方式转变为独立后的新一代哈萨克精英。

独立后的哈萨克精英的组成结构、价值趋向与行为方式直接影响着哈萨克斯坦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方向。对哈萨克精英而言，独立建国的工作可谓千头万绪，包括从主体民族、通用语言的确立，到国家内外政策的制定、边界的划分、跨国跨境问题的处理等。在众多工作中，国体和政体的确立至关重要，关系到国家的发展前途和发展方向。以纳扎尔巴耶夫为首的政治精英在哈萨克斯坦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框架，通过确立总统制民主共和国走上了不同于苏联时期的发展道路。

对哈萨克精英发展进程和典型特征的研究与分析，不仅可以帮助学术界深入了解当今哈萨克斯坦政治发展的特殊性，也可以在体制变革与国家治理方面，为其他转型国家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而且也有助于剖析中亚地缘政治经济变动的缘由与区域合作的趋势。

正是由于哈萨克精英在沙俄崩溃、苏联解体与民族国家社会转型中所显示出的独特作用，各国研究中亚政治体制的学者对哈萨克斯坦社会转型中的精英问题给予了极大关注。而哈萨克斯坦学者对本国民族精英的研究早在独立之初就已开启，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哈萨克汗国并入沙俄前后的制度与社会变迁，阿拉什民族解放运动，以及“大清洗”之后政治精英在苏联政治体系中的生成、演变、流动、作用及其地位等。由于20世纪初的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的经验对新独立的哈萨克斯坦极为重要，因此该时期的政治精英与社会转型研究被视为整体，并且为此设立了独立研究中心<sup>①</sup>，而其他时期的研究则以个人为主<sup>②</sup>。对欧美学者而言，研究苏联时期和包括哈萨克斯坦在内的独联体地区转型时期的精英问题依然是热门的区域政治研究议题，即考察当地精英阶层的历史演进，分析政治精英

<sup>①</sup> 首个阿拉什研究中心成立于2008年，位于东哈萨克斯坦州塞梅伊市国立教育学院（Семей Мемлекеттік Педагогикалық Институты）。之后，以研究阿拉什为宗旨的科学中心分别于2009年和2011年在阿拉木图与努尔苏丹（阿斯塔纳）成立。2017年计划在西哈萨克斯坦州首府乌拉尔市建立西阿拉什奥尔达研究中心，以便研究阿拉什运动在西哈萨克斯坦地区的影响与运作。

<sup>②</sup> 穆斯塔法·绍凯研究中心，是由克孜勒奥尔达国立大学（Кызылорда Мемлекеттік Университеті）所建，成立于2016年，是专注研究浩罕与阿拉什自治政府的机构。而穆斯塔法·绍凯（Мустафа Шокай）则是浩罕自治政府最高领导人，是哈萨克杰出的政治家与思想家。

的生成方式、流动渠道以及功能模式<sup>①</sup>。而俄罗斯学者则在借鉴并吸收西方传统与当代精英理论的基础上，通过相关研究所与中心对独立后的哈萨克斯坦社会转型过程进行深入分析<sup>②</sup>。相比较而言，中国在哈萨克斯坦问题研究领域中将精英研究纳入中亚问题当中，并且主要研究其政治与经济的转型历程，因此专门研究哈萨克精英的著述并不多见<sup>③</sup>。有鉴于此，本文在充分借鉴各国学者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哈萨克精英政治行为中的“人”为研究对象，运用精英理论、转型政治学及地缘政治学相关理论，分阶段地以历史脉络为线索，运用历史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哈萨克精英的形成过程、组成方式等进行归纳和总结。在哈萨克斯坦社会中，统治精英的组成与古典精英理论的主张较为相似，既单一且封闭。影响哈萨克斯坦政策规划的核心中央行政官员、民意代表、利益团体与专家学者均以哈萨克三大玉兹二十个部落的精英组成，所以本文重点是研究哈萨克精英在近两个世纪的社会转型中的作用，分析其权力地位与结构变化，以及权力互动对中亚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

## 一 殖民前夕的哈萨克传统精英结构

自1456年乌兹别克之苏丹克烈和贾尼别克与汗王阿布海儿反目成仇，率部迁至蒙兀儿斯坦七河流域建国之后，以阿克奥尔达（白帐汗国）可汗兀鲁斯后裔为核心的统治集团开启了新的区域民族整合与身份构建进程，并先后通过远交近攻的策略逐渐扩张吸收接纳草原与河中各政治势力，于16世纪初哈斯木王朝时期达到鼎盛。虽然它未能彻底歼灭敌对的河中昔班尼王朝，但却确立了以哈萨克汗国为中心的“草原朝贡体系”，同时成功建立了由草原二十部构成的三大玉兹行政区划体系及阿克苏聂克一硕章儿精英统治阶级，最终在16世纪末的哈萨克

---

<sup>①</sup> Anthony Clive Bowyer, *Parliament and Political Parties in Kazakhstan (Silk Road Papers)*,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Policy, 2009; Sally Cummings, *Kazakhstan: Power and the Elite*, London: I. B. Tauris, 2005; Robert M. Cutler, *Kazakhstan Holds Elections for a New Parliament*, *Central Asia – Caucasus Analyst*, Washington DC: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2004.

<sup>②</sup> 俄罗斯政治研究中心（*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России – Центр*）成立于1994年，研究包括全球安全、核不扩散、国际信息安全与全球互联网治理等在内的地缘政治挑战与威胁议题。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成立于1956年，是俄罗斯享有盛誉的国际研究中心，研究重点为世界发展趋势、社会经济政治与国家战略。

<sup>③</sup> 包毅：《中亚国家的政治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李淑云：《中亚转型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张保国：《苏联对中亚及哈萨克斯坦的开放》，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纳扎尔王朝时期将其巩固下来<sup>①</sup>。

### （一）三大玉兹行政区划体系之地缘政治意义

哈萨克汗国管理制度是由“三梁二十柱”来支撑，所谓的“三梁”是指三大玉兹，即大玉兹、中玉兹和小玉兹，而“二十柱”则是构成三大玉兹的二十个部落。语言、文化、历史相近的部落在近百年的迁徙过程中，在指定区域相互接触、沟通、了解、合作、融合，最终形成区域命运共同体，即玉兹。流淌于哈萨克大地上的三大流域养育了三大玉兹，滋养了各个部落。其中叶德尔河（伏尔加河）与扎伊克河（乌拉尔河）流域孕育了小玉兹三部联盟，萨尔苏河、叶西尔河（伊希姆河）与额尔齐斯河流域孕育了中玉兹六部联盟，而七河流域则孕育了大玉兹乌孙部落联盟。除了地理因素外，影响三大玉兹形成的还有特殊的政治因素，即区域地缘政治。历史上哈萨克斯坦西部地区由乌古兹、金帐和诺盖汗国相继统治，七河流域经历了西突厥、突骑施、葛逻禄、喀喇汗、西辽、察合台与蒙兀儿斯坦等王朝，而哈萨克丘陵—阿勒泰—巴尔喀什湖则是敕勒、基马克、钦察、斡儿答与库克奥尔达（蓝帐汗国）的摇篮。公元15世纪至16世纪期间，持续近百年之久的哈萨克部落融合过程告一段落，三大玉兹相继成型。由于各部落的定居点和迁徙路线时常发生变化，因此部落间的边界与土地问题愈发严重。对此，各玉兹汗王会对其结构进行调整与协调。哈萨克汗王就是为了避免内部权力平衡的失调、防止爆发内部冲突、保持势均力敌的局势才施行以部落为核心的管理体制<sup>②</sup>。

### （二）世袭统治阶级之阿克苏聂克（Ак сүйек）

阿克苏聂克是指东钦察草原地区由成吉思汗家族术赤系后裔所组成的部族统治集团成员，同时也指包括河中与蒙兀儿斯坦地区的察合台系后裔<sup>③</sup>。由于哈萨克汗国北起托博尔河，南至锡尔河，西起阿特劳，东至阿勒泰。因此，北部臣民在辽阔的哈萨克草原从事游牧与半游牧生产，而聚集于锡尔河流域绿洲城镇的南部臣民则从事商业与农业生产。为了有效维护游牧社会长久以来的氏族部落秩

<sup>①</sup> Б. Аяган. “Қазақстан” Ұлттық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V том. Алматы: “Қазақ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сының” Бас редакциясы, 2003. Б. 436 – 437.

<sup>②</sup> Ә. Нысанбаев. “Қазақстан” Ұлттық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IV том. Алматы: “Қазақ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сының” Бас редакциясы, 2002. Б. 86 – 87.

<sup>③</sup> Н. Уәли, Ш. Құрманбайұлы, М. Малбақов, Р. Шойбеков. Қазақ сөздігі (Қазақ тілінің біртөмдік үлкен түсіндірме сөздігі). Алматы: “Дәуір” баспасы, 2013. Б. 58.



序，汗国最高统治者采用以部落为核心的民族管理体制对三大玉兹进行统一治理。

按照民族管理体制，哈萨克汗国被划分为汗庭、玉兹、兀鲁思、阿勒斯、部落、氏族、祖区与阿吾勒，共七层阶梯型的社会结构。阿吾勒作为哈萨克社会的根基由拥有紧密血缘关系的十帐组成，其领导人称为阿乌勒巴斯（Ауылбасы），由当中最年长、最富有、最公正和具有绝对权威的人担任。阿乌勒巴斯的职责是依法征收税款，协助村民完成牧业生产和季节性草场迁徙等作业，并且协调村民间的纷争。祖区是由祖宗七代分化而成的数个阿乌勒组成，其领导人称为阿克萨卡尔（Аксакал），由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中年人士担任。氏族则由十三至十四个祖区构成，而氏族进而演化为部落，其领导权掌握在氏族（Рубасы）或部落领袖手中<sup>①</sup>。由比（Би）负责治理的阿勒斯由数个部落构成，被视为汗国的中坚力量。相对而言，作为权力核心基础的兀鲁思是由数个阿勒斯组成，苏丹（Султан）负责其引领。数个兀鲁思则组成玉兹，由汗王（Хан）负责统帅。最后由三大玉兹共同构建汗庭，其统治者为大汗（Үлы Хан）。在哈萨克汗国权力体系中苏丹与汗王的继承权与统治权均由成吉思汗之子术赤后裔世袭垄断<sup>②</sup>。

哈萨克汗国最高统治者为大汗，拥有行政、民事、军事和司法等方面的一切权力，其地位至高无上。大汗实行世袭终身制，其汗位通过嫡长子继承制选举产生，即由正妻所生长子继承，而如果大汗嫡长子尚未成年，则可允许汗王兄弟或其子嗣继位。在登基之前大汗必须获得由各地苏丹和部族硕章儿组成的忽里勒台大会的一致同意，方可举行“高拾可汗”登基仪式，得到各部族的承认，并以此实现权力最终合法化。成为大汗的另一个最为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继承者必须是黄金家族的直系后裔，即托雷（Төре）<sup>③</sup>。汗王身为统治阶级（家族）和所有部落的最高宗主，其主要职责是以武装力量保护本国领土与臣民不受外敌侵犯，即所谓军队最高统帅。不仅如此，汗王对外代表国家，有权委派驻外使节、对外宣战、媾和与缔结条约，掌握外交大权，而且为维护社会秩序与安定具有行使发号施令的权力，在全国范围内拥有生杀大权。

<sup>①</sup> М. К. Каратаев. Казак Совет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сы I том. Алматы: Казак Совет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сының Бас редакциясы, 1972. Б. 581 – 583.

<sup>②</sup> Б. Аяған. “Казакстан” Ұлттық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IX том. Алматы: “Казак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сының” Бас редакциясы, 2007. Б. 295 – 296.

<sup>③</sup> Б. Аяған. “Казакстан” Ұлттық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VIII том. Алматы: “Казак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сының” Бас редакциясы, 2007. Б. 475.

在哈萨克汗国管理制度中作为体制核心的汗王、苏丹、比、巴特尔、图林格特、和卓与阿克萨卡尔等统治精英是贯穿其中的总骨架，起着统领作用。其中垄断汗位与苏丹权杖的黄金家族通过巧妙和残酷地使用占优势的军事战术而实现对钦察草原的统治，这种战术把部队快速运动的非凡能力与部队的及时集结结合起来。不难看出，成吉思汗术赤系家族的统治基础建立在军事优势之上。但这种优势严重依赖当地被统治的部落，导致缺乏文化优越感的黄金家族因人数太少，未能形成一个自我繁衍的统治阶级，最终在文化方面被更加先进的操突厥语民族逐步同化，其子孙变成了中亚地区具有突厥与伊斯兰特征的统治者。另一方面，黄金家族这种心甘情愿的同化过程，可以被视为进一步适应当地条件、持续维持统治的举措<sup>①</sup>。

### （三）地方统治阶级之硕章儿集团（Шонжар）

硕章儿是指通过汗庭大会共同商讨国事且一同辅佐大汗的苏丹、图林格特、巴特尔、和卓、比等地位仅次于汗王的地方贵族集团。哈萨克汗国之汗庭大会以古老草原法则为基础，依照《哈斯木汗法典》《额什木汗法典》和《头克汗七部法典》行使立法与司法权力。随侍汗王左右的使令、侍从与护卫均被称为图林格特（Төлеңгіт），他们按照等级服侍各级官员。服侍汗王与苏丹的图林格特首先发挥着通讯官的功能，将诏令圣旨昭告于天下。其次，担任各地的征税官，保障国家税收收入的安全完整，最后则任命为护卫汗王或汗庭警备任务的禁卫军。相反，低等级的图林格特在服侍汗王与苏丹时只负责其日常起居与家产相关的管理工作<sup>②</sup>。

和卓（Кожа）是拥有特殊权益的封闭式宗教精英群体，《头克汗七部法典》明确规定，污蔑或对和卓造成巨大生命损失者将受重罚。不仅如此，和卓全体都被免除了赋税的社会责任，而且唯独可汗与苏丹方可介入其内部事务。作为地区积极活跃的伊斯兰教传教士，其在城镇享有得天独厚的威望与影响力。虽然和卓由于自身的封闭性与宗教局限性未能跻身汗庭担任要职，也未获得汗王的青睐，但自始至终都发挥着政治与思想工具的作用，在民间通过宗教的力量巩固汗庭的

<sup>①</sup>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Grand Chessboard –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8, pp. 9 – 11.

<sup>②</sup> 图林格特、和卓和托雷一同被视为哈萨克民族中的亚文化群体。



统治合法性与正当性<sup>①</sup>。

比（Би）在推动哈萨克汗国法律体系的发展，强化社会法政意识与切实做到实体公正和程序公开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他们是连接民间与汗庭之间的桥梁，在立法和商讨国事的同时，一方面在汗庭为民请愿，另一方面在民间为国分忧。因其独有的雄辩才智和强烈的正义感，深受高官的尊敬和民众的爱戴。而由众多比组成的汗庭法官大会则是国家最高立法机构，权力之大，可与大汗相抗衡。汗国各大法典均由汗庭法官大会的层层审议方才通过生效，其中包括增强地方自治及改变国家政治权力结构平衡的《头克汗七部法典》。该法典在肯定比在立法与司法领域权威的同时，提高了比在国家政治制度中的地位，其地位史无前例地超越了苏丹，仅次于大汗。甚至在国难当头之际，有权暂时顶替汗王，行使最高权力。与此同时，比还充当国师和使节，与敌对话谈判，与友商讨对策<sup>②</sup>。

与比一同能够左右汗国内政和外交的另一个精英群体是巴特尔（Батыр）。该群体跟比一样，由各土著部落中的精英组成，初期隶属于地方精英集团，但对中央汗庭的影响力随着《头克汗七部法典》的颁布而与日俱增。可是，与比不一样的，该群体以军事起家，在给汗国带来荣耀的同时也提高了本部落的声望。在政治体制结构中巴特尔不仅仅代表各自的部落，更多是代表自身所属玉兹。巴特尔凭借个人综合素质与指挥能力在军事领域扶摇直上，最高可同时担任三大玉兹统帅，最低则以领袖身份引领部落。必要时也出任外交使节之职，出使他国。汗国后期，受《头克汗七部法典》中权力下放与提高地方自治原则的影响，巴特尔开始逐步掌控苏丹之权，成为精英阶层当中不可忽视的新政治力量<sup>③</sup>。

在哈萨克汗国近四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不难发现，君主制框架下的汗国精英阶级是由政治与军事精英组成。准确地讲，汗国的统治权掌握在大汗、苏丹、图林格特、和卓、比、巴特尔等精英手中。其中大汗和苏丹属于中央精英，其权力由托雷世袭垄断，而比和巴特尔则属于地方精英，由各部落成员依靠其自身能力胜任。在汗国建立初期，所有重大决策均由一个狭小的政治和军事精英层决定，即托雷。在头克汗进行体制改革之前，哈萨克精英的权力排序为大汗—苏丹—

① Э. Т. Телеуова. Дәстүрлі казак қағамының ① әлеуметтік – құқықтық ерекшеліктері. Алматы: Казак университеті, 2007. Б. 69 – 70.

② Ә. Нысанбаев. “Қазақстан” Ұлттық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II том. Алматы: “Қазақ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сының” Бас редакциясы, 1999. Б. 317 – 319.

③ М. К. Қарағашев. Казак Совет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сы II том. Алматы: Казак Совет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сының Бас редакциясы, 1973. Б. 322 – 323.

比—巴特尔（二对二），之后则变为大汗—比—苏丹—巴特尔（一对三）。大汗为避免哈萨克中央与地方因外部强大军事压力而松懈脱钩，进而选择牺牲托雷垄断贵族的部分权力，换取地方对中央的忠诚，由此将权力核心的大门向地方精英敞开，开启了新一轮的权力结构重组<sup>①</sup>。

## 二 沙俄时期哈萨克精英转型

沙俄为吞并哈萨克汗国花费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其核心策略为渗透，而实施手段和方式则因时而异。沙俄最初希望通过自身软实力逐渐分化哈萨克社会，在改变地方权力与社会管理制度之结构的同时，削弱其政治基础，实现全面控制与支配。为此，沙俄首先利用自身位于边界地带的堡垒群，通过其所具有的区域硬实力直接干涉哈萨克边缘地带部落内政，依照沙俄法律直接介入地方纠纷。与此同时，派遣鞑靼传教士进入哈萨克北部地带，教化当地萨满残余，将其纳入以沙皇为核心的政教体系当中，控制当地意识形态<sup>②</sup>。

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的政教双管齐下政策表面上看起来天衣无缝，但实质上却漏洞百出，尤其是在动乱时期。处于边缘地带的亲俄派哈萨克精英在和平繁荣时期行走于总督与苏丹之间，呈现出的是绝对的伪忠诚，扮演的是两面派角色。但是，当局势发生变化、皇权开始动摇之际，所有亲俄派的族性特征凸显，不由自主地被汗权核心所吸引，变成无法预估的潜在最大政治隐患。相反，皇权得到巩固与强化之后，亲俄派瞬间反变为忠臣，视自己为朝廷之栋梁，不惜一切代价证明自身价值之所在<sup>③</sup>。

保罗时期沙俄当局深刻反思，认识到之前所奉行的“以夷制夷”之计不仅不足以颠覆当地政权，而且还无力抗衡以托雷为核心的汗庭政府。苏丹阶级的反俄倾向导致位于哈萨克权力金字塔顶端的托雷集团瞬间变为沙俄当局的眼中钉。圣彼得堡为了削弱托雷集团的政治影响力与号召力，决定在“以夷制夷”的基础上延伸，在拉拢部落领袖与贵族的同时，也逐步培养亲俄的汗王，实施双汗

<sup>①</sup> Э. Нысанбаев. “Қазақстан” Ұлттық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II том. Алматы: “Қазақ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сының” Бас редакциясы, 1999. Б. 184.

<sup>②</sup> Нуржан Жетпісбай. Ресей билігі қазақ жерін озыне қарату жолында барлық амал – шараларды қолданды//Аң ыз адам Ресейдың, туң ғыш императоры I Петр, 2015, № 21 (129).

<sup>③</sup> Әбілдабекова Айгүл. Ресей империясының Қазақстанда жүргізген саясаты//Қазақстан Мектебі Республикалы ғылыми – педагогикалық журнал, 2010, № 1.

制，达到“以毒攻毒”的效果<sup>①</sup>。

亚历山大一世时期，沙俄获得拿破仑战争之胜利，进而成为名副其实的欧陆军事强国，之后决心彻底吞并哈萨克汗国，分别于1822年7月和1824年3月签署颁布《西伯利亚吉尔吉斯条例》与《奥伦堡吉尔吉斯条例》，宣告哈萨克汗国正式亡国，并且废除哈萨克地区原有的政治统治制度<sup>②</sup>。取代哈萨克可汗制的是沙俄县区制，之前的七层阶梯式管理制度简化为三层，即县、博鲁斯和阿吾勒。前朝统治阶级阿克苏聂克虽垄断县区苏丹首长一职，但彻底沦为地方精英且边缘化，而硕章儿集团的影响力与经济实力仅存于哈萨克地区，伴随俄国殖民政策的深化逐渐收缩弱化<sup>③</sup>。

19世纪中期，克涅萨勒汗的复辟运动以失败告终，哈萨克老权贵明确意识到被殖民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合并已成既定事实，无谓的抵抗只能加大沙俄的迫害程度，不异于自取灭亡。哈萨克传统政治精英也清楚地知道哈萨克之所以被殖民，其原因表面上看起来是科技落伍，实质上却是制度与思想的严重落后，唯独教育改革方可实现哈萨克社会的现代化，进而扭转劣势<sup>④</sup>。

在改革范畴及重点方面，中小玉兹虽看法与意见不一，却始终坚持人文主义自由思想观。受西西伯利亚总督府控制的中玉兹虽然提倡学习吸收西方文化思想，但却始终坚持“另起炉灶”的教学原则，强调在不侵蚀哈萨克原有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实现创新。而受制于奥伦堡总督府的中玉兹受小玉兹政治教育观念的影响，选择了“深入核心”的教育原则，认为只有通过文字改革方可实现教育普及化。所以，西伯利亚地区的中玉兹希望通过社会精英的力量自上而下地推广新文化。相反，小玉兹上层亲俄派俄罗斯化程度相对较深，坚持双语教育全民化。该时期代表哈萨克“军文科教”领域的核心精英代表是小玉兹托雷出生的古拜度拉·江格尔罗夫与中玉兹托雷出生的乔罕·瓦里汉诺夫，以及中玉兹钦察部的易卜拉欣·阿尔丁萨林和阿尔根部的阿拜·库南巴耶夫。

① Б. Ф. Аяган, Х. М. Әбжанов, А. И. Исин. Казак хандығы тарихы: қурылуы, өрлеуі, құлдырауы. Алматы: “Сөздік – Словарь”, 2011. Б. 291 – 295.

② Н. Ә. Алдабек. Ресейдің Орталық Азиядағы отарлық саясатының қалыптасу тарихынан//Әл-Фараби атындағы Казак Ұлттық Университетінің Хабаршы Халықаралық қатынастар жөне халықаралық қуқық сериясы, 2004, № 3 (15).

③ З. Е. Кабылдинов, А. Т. Кайыпбаева. Казакстан тарихы (XV III ғасыр – 1914 жыл). Алматы: Атамұра, 2012. Б. 100 – 101.

④ С. Муканов. Кенесарыға қарсы күресіп, орыс патшасынан шен – шекпен алған казак билері мен султандары//Аң ыз адам Кенесары Касымұлы, 2011, № 21 (33).

哈萨克首位骑兵将军江格尔汗之子古拜度拉，幼年就读于圣彼得堡帝国贵军官学校，毕业后一路由公爵升格至骑兵大将，并且担任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亚洲问题私人顾问。他不仅参与了土尔克斯坦边区管理章程与首届全俄杜马选举规定相关的法律制定工作，努力为哈萨克人争取政治权益，而且还帮助哈萨克优秀贵族子弟顺利进入俄中部高校，接受现代化教育，培养新一代哈萨克人才与精英骨干<sup>①</sup>。

与骑兵将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代表哈萨克近代文学巅峰的诗圣阿拜，其年满10岁之际被官父送往塞米巴拉金斯克市的艾哈迈德·里扎鞑鞑经学院接受为期三年的穆斯林式教育，并于第三年在该市俄罗斯教区学校学习俄语。学成归乡之后涉足地方政坛，出任地区博鲁斯苏丹，并被推举为负责制定塞米巴拉金斯克哈萨克刑法条例首席大法官。晚年时期，他专心钻研文学，奠定了哈萨克书面文学的基础，通过将基于伊斯兰的自由主义与俄罗斯、西欧文化相结合的方式复兴哈萨克文化，史无前例地将科学精神提高至足以振兴民族的高度，被后人视为哈萨克民族复兴精神先驱与领袖<sup>②</sup>。

而哈萨克大汗阿布赉三世孙乔罕，幼年遵循祖训就读于父亲开办的昆提蔑斯村校，接受穆斯林式教育，后被送至当时首屈一指的西伯利亚军校继续深造。完成学业之后，担任西西伯利亚司令理事会地方事务官并协助研究翻译中亚各族典籍。因能力出众获俄罗斯地理学会批准，独自完成了被西方认为是“相当危险的”喀什之行，并编写了著名的《中国南路省区六城“小布哈拉”之现状》，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亲自召见并授予四级圣弗拉基米尔勋章，将其提拔为本部骑兵队长<sup>③</sup>。乔罕的贡献还给英俄地缘政治博弈增加了变数，弥补了沙俄的地缘结构性缺陷，争取到了战略主动权，为其实现战略突破创造了条件<sup>④</sup>。

相比较前三位优秀人士，幼年丧父，由地方官祖父一手培养的易卜拉欣是该时期对哈萨克教育转型过程影响最深的特殊人物。在年满9岁之际，听从祖父之

① Г. К. Мукатаев, М. В. Ирхина. Султан Губайдулла Чингизхан – полный генерал от кавалерии: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Санкт – Петербург: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 В. Ирхиной, 2003. С. 159.

② Ж. Дәдебаев, Ө. Әбдіманұлы, Т. Кәкішев, З. Бисанғали, З. Сейітжанов, Ж. Тілепов, А. Салқынбай, М. Үмбетәев, Р. Турысбек, П. Бисенбаев, Е. Кәрібозов. Абайтануға<sup>1</sup> дамалы<sup>1</sup> бектер VIII том. Пәнаралық зерттеу. Алматы: Казак университеті, 2016. Б. 24 – 25.

③ Очерк жизни и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Ч. Ч. Валиханова//Валиханов Ч. Ч.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пяти томах. Т. 1. Алма – Ата: Главная редакция Казахской советско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и, 1984. С. 9 – 79.

④ Р. С. Мырзабекова. Ресей империясының Улыбританиямен Орта Азия бағытында ықпал ету аймағы үшін бәсекеестік күресі//Әл – Фараби атындағы Казак Ұлттық Университеті Хабаршы Тарих сериясы, 2004, № 2 (53).

训，前往奥托堡接受现代化初级教育。后以优异成绩顺利毕业返乡担任地方翻译官一职，开始筹划全民性的教育事业，出任学府总监，通过双语教育的方式，开导学生迈向新思维，改变其传统逻辑思考模式，实现思想现代化目标<sup>①</sup>。不仅如此，他还坚持男女平等发展，开设女子学校，杜绝男尊女卑与重男轻女的歧视性传统文化<sup>②</sup>。

### 三 革命时期哈萨克精英的转型

在迈入 20 世纪之际，随着启蒙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各地初级教育机构稳步增加，内部教学质量与办学水平不断得到提高，哈萨克社会融入沙俄政治经济体制的步伐加快，追求平等的呼声和对参与国家建设的影响力逐渐增强，进而导致哈萨克精英对更高质量教育的需求日益扩大。圣彼得堡成为了哈萨克新一代政治精英的摇篮<sup>③</sup>，而帝国境内的莫斯科、喀山、基辅、鄂木斯克、托木斯克、奥伦堡、萨拉托夫、萨马拉等主要核心重镇与境外的华沙、伊斯坦布尔、孟买和开罗一道，培养着哈萨克新一批具有人文情怀、科学精神、专业素养、国际视野的专业人才，实现哈萨克精英多样化与多元化<sup>④</sup>。

1904 年 2 月 8 日，日俄战争爆发，双方在辽东半岛及朝鲜半岛一带海域开展了长达一年半的陆海争夺之后，最终以沙俄惨败而告终。自此沙俄国内动荡不安，革命愈演愈烈。此时活跃于圣彼得堡的哈萨克大学生相继组建各自的精英社团，与喀山和莫斯科地区的精英社团保持书信往来，提出了“积极向东学习日本，学取欧洲之精髓，拒绝向西学习土耳其，划清与布哈拉等东方国家的界限，为创建新文化教育事业而奋斗”的立场，并且要求沙俄政府给予哈萨克文化政治之平等权益与自治，疏远东方向西靠拢。第一次俄国革命不仅唤醒了就读于俄罗斯高等学府的哈萨克学生，而且还唤醒了所有哈萨克知识分子。此后，哈萨克精英各派观点立场汇聚于一体，与乌勒套三杰精神相融合，形成了博大精深的阿拉什思想<sup>⑤</sup>。

① Ж. Қасымбаев. Қазақстан тарихы (XVIII ғасыр – 1914 жыл). Алматы: Мектеп, 2012. Б. 186 – 187.

② Жанбол Жылбаев. Ағартушы айдыны // Егемен Қазақстан, 2016, № 210.

③ Ә бліуақап Қара. Мұстафа Шоқай. Астана: “Педагогика – Пресс Баспа үйі”, 2012. Б. 22 – 23.

④ С. Кенжеахметов. Қазак зиялылары XIX ғасырдың аяғы мен XX ғасырдың басында жоғары оқу орнында оқыған казактар // Ақиқат ұлттық қоғамдық – саяси журнал, 1994, № 7.

⑤ Қазақстан Республикасының Ұлттық Қауіпсіздік Комитетінің Архивы. 2370 – іс. 3 – т. 52 – п.



面对史无前例的政治压力与危机，沙皇尼古拉二世暂时作出有限让步，于1905年发表10月17日宣言，承诺给予公民自由，召开国家杜马，举行全国普选，实行多党制<sup>①</sup>。对此，哈萨克精英纷纷积极响应，先后参与自治主义者联盟及第一届杜马选举<sup>②</sup>。可是，仅存72天的首届帝国杜马被沙皇强制解散，其选举过程和权力结构矛盾引发哈萨克政治精英与知识分子的强烈不满，立宪民主党愤怒地集结了杜马中的182名议员在芬兰维堡召开会议，会后发表了《维堡宣言》，哈萨克议员布克伊哈诺夫与萨林克列一同签名表达支持<sup>③</sup>。民主派谴责沙皇解散杜马之举违宪越权，同时呼吁民众拒绝缴税和拒服兵役，但却收效甚微，由此可见以知识分子为核心的新一代哈萨克政治精英虽在思想教育领域影响甚大，但在社会基层不敌传统硕章儿。

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的哈萨克政治精英希望建立哈萨克资产阶级，发展资本家土地所有制，推广资本主义，建立市场经济，其目的是土地所有权政治化，避免土地被贫农私有化，防止北方异域资本家或富农借机兼人购买，阻止新移民进一步南迁，维护哈萨克领土完整。十月革命爆发后，面对随之而来的内战，哈萨克主流政治精英分化为两派。一派是以传统民族主义为核心，由北方草原中玉兹托雷之阿里汗·布克伊哈诺夫领导的阿拉什奥尔达政府。另一派是以泛民族主义为核心，由南方锡尔河流域中玉兹钦察部之穆斯塔法·绍凯领导的浩罕自治临时政府。前者倾向北方联盟，认为南方河中地区民众宗教意识过强，思想过于保守落后，因此希望与北方欧化程度较高的伏尔加鞑靼—巴什基尔人联合。而后者则认为只有团结中亚各族方可与俄罗斯相抗衡，否则一事无成，所以主张与南方绿洲城镇地区的乌兹别克—鞑靼人联合。

哈萨克统独两派同源异流，两者政治路线虽模棱两可，但在地缘政治与安全议题上立场一致，奉行“亲白反苏”的武装政治路线。但战局的改变导致哈萨克形势进一步恶化，武装冲突的战火在哈萨克各地持续燃烧，西北部乌拉尔地区全境饱受战火蹂躏，迫使浩罕自治临时政府领导人绍凯流亡法国<sup>④</sup>，坚持哈萨克

① Обнинский В. П. Новый строй. Ч. 1. Манифесты 17 октября 1905 г. – 8 июля 1906 г. Москва: Образование, 1911. С. 7 – 8.

② Е. Тілешов, Д. Камзабекулы, И. Нурахмет. “Алаш” козгалысы. Алматы: “Сардар” баспа үйі, 2008. Б. 206 – 207.

③ Шелохаев В. В., Аринин А. Н., Журавлев В.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дум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1906 – 1917: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Москва: 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2008. С. 113 – 114.

④ Әбдіуақап Қара. Мұстафа Шоқай. Астана: “Педагогика – Пресс Баспа үйі”, 2012. Б. 166 – 167.



领土完整的阿拉什奥尔达政府与土尔克斯坦军区司令伏龙芝在奥伦堡进行谈判。在得到政治安全保障之后，哈萨克革命委员会于1920年3月5日宣布《解散阿拉什奥尔达西部政府法令》<sup>①</sup>，自此延续15年的阿拉什哈萨克民族解放运动告一段落，其政府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哈萨克精英与社会则一同踏入崭新的苏维埃时代。

#### 四 苏联时期哈萨克精英的转型

内战结束之后苏俄中央为进一步巩固地区统一与稳定，决定在哈萨克地区建立苏维埃式高等教育机构，自此前朝阿拉什精英退居二线，作为地方文化精英继续引导民众并影响民族国家的建构与发展。

1920年，吉尔吉斯（哈萨克）中央执行委员会开始依据《登记吉尔吉斯自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具有学历的哈萨克人士法令》对自治共和国境内所有16~53岁受过俄罗斯语或哈萨克语教育的公民进行登记调查。1922年，根据哈萨克人民委员会所通过的《国家干部限制令》，自治共和国境内的私营企业（包括合营企业与商会）工作人员及其相关行业（承包商、中间商及供应商）员工不得被录用为公务员。自此，出生阿克苏聂克与硕章儿的哈萨克资产阶级政治精英（以下简称“民派”）被政治边缘化，并且与莫斯科中央一手提拔或分化而出的新哈萨克政治精英（以下简称“苏派”）对立<sup>②</sup>。

民苏两大政治派系无论是在出生背景，还是教育程度方面均存在巨大差异。绝大多数民派精英出生于19世纪中叶，主要为地方贵族子弟，毕业于帝国中西部地区著名高等学府，是帝国境内哈萨克首批高等知识分子。其核心政治观形成于19世纪末，并且在20世纪初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投身于政治，主张人文主义、民主宪政、民族平等、思想自由<sup>③</sup>。由于在内战期间曾长期反苏援白，因此被布尔什维克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苏派精英出生于19世纪末，多数家境贫寒，

<sup>①</sup> К. Нурпейсов. Алаш Ғ ө м Алашорда. Алматы: “Ататек”, 1995. Б. 195 – 212.

<sup>②</sup> Ыскак Акмарал Сыдығалықызы. Кең естік Қазақстандағы Республикалық басқару органдарының қылыптасуы мен қызметінің тарихы (1920 – 1936). Отан тарихы (Қазақстан Республикасы тарихы) Тарих ғылымдарының кандидаты ғылыми дәрежесін алу үшін дайындалған диссертацияның авторефераты. Алматы: Өл – Фараби атындағы ҚазҰУ, 2002. Б. 13 – 14.

<sup>③</sup> С. Кенжеахметов. Қазақ зиялылары ХІХ ғасырдың аяғы мен ХХ ғасырдың басында жоғары оқу орнында оқыған қазақтар // Ақиқат ұлттық қоғамдық – саяси журнал, 1994, № 7.

所受教育程度仅局限于西伯利亚省区初中级基础水平，而核心政治观则形成于民族解放运动时期，权力基础建立于反帝国主义事业之上，即所谓工农兵子弟<sup>①</sup>。苏派精英意识形态虽保持一致，但在民族（自治共和国）发展道路与路线方面意见却不一，可分为坚持文化自主路线派与服从中央改革派。

哈萨克民苏两派精英虽在意识形态领域存在难以跨越的鸿沟，但双方却在民族文化复兴和教育普及化议题上持一致立场，其最具代表性的是哈萨克文字拉丁化改革<sup>②</sup>，但在苏联中亚地区民族国家划界工作开启的迁都事宜上两派分歧巨大。民派倾向于保留奥伦堡的国都地位，并且赞成两州的合并事宜，认为两州合并可以将俄罗斯人占多数的奥伦堡州哈萨克化。苏派则强烈主张迁都，强调奥伦堡地区俄罗斯沙文主义残余思想根深蒂固。争论导致苏维埃政府及党组织成员间矛盾频发，最终苏派占据上风，顺利将国都从奥伦堡迁至哈萨克三大玉兹均势力敌的阿克梅切特，并将其都名改为克孜勒奥尔达（即红色奥尔达）<sup>③</sup>。

首任俄共（布）哈萨克边区委员会书记戈洛谢金在出任伊始就认为哈萨克地区落后于历史进程，提出在哈萨克自治共和国进行“小十月革命”的政策，“大清洗”运动与大饥荒由此爆发<sup>④</sup>。截至1954年，大清洗在哈萨克地区共波及10.3万人，其中2.5万人被枪决，占哈萨克知识分子人口的46.3%。其中很多人是科研、文化、政治领域的知识分子和功勋人员<sup>⑤</sup>。包括苏派在内的前阿拉什运动积极分子首当其冲，被定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以“组建试图推翻苏联的反革命组织”“阶级敌人”“民族主义分子”“异议分子”“社会威胁分子”“日本间谍”等罪名被枪决或流放<sup>⑥</sup>。自此，传统哈萨克政治精英均被彻底根除，上下紧密的部族纽带关系一度脱钩。

赫鲁晓夫上任伊始就开始通过大开荒将哈萨克中玉兹地区俄罗斯化，与出身

① М. К. Каратаев. Казак Совет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сы VI том. Алматы: “Казак Совет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сының” Бас редакциясы, 1975. Б. 219 – 220.

② Ә. Нысанбаев. Казакстан Ұлттық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I том. Алматы: “Казак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сының” Бас редакциясы, 1998. Б. 676 – 678.

③ Ерлан Жалмаганбетов. Казакстан астанасын Кызылордага көшіру // Казак тарихы ғылыми – әдістемелік журнал, 2013, № 1 (118).

④ Амантай Кәкен. Ұлтшылдықпен күрес немесе казак зиялыларының қасіреті // Түркістан халықаралық саяси апталық газет, 1998, № 5 (188).

⑤ Б. Аяган. Казакстан Ұлттық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V том. Алматы: “Казак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сының” Бас редакциясы, 2003. Б. 226 – 228.

⑥ К. Г. Даркенов. Казак зиялыларын айыптау мен қутындау (XXI. 30 – жылдары) // Абай атындағы Казак ұлттық педагогикалық университетінің Хабаршысы Тарих және саяси – әлеуметтік ғылымдар серия, 2010, № 3 (26).

北方中玉兹阿尔根部的哈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卓玛拜·沙亚赫梅特夫发生了根本性的矛盾。身处东南大玉兹腹地的沙亚赫梅特夫深知此次大开荒会彻底改变祖地北部中玉兹地区的社会结构与民族比例，但最终无力抵制，被降级为南哈萨克州党委第一书记<sup>①</sup>。1964年上台的勃列日涅夫在执政伊始就开始推行干部民族化与本土化，出生阿拉木图大玉兹厄斯特的丁穆罕默德·库纳耶夫再度出任哈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直至戈尔巴乔夫上任执行改革，共22年。在此期间，库纳耶夫成功运用哈萨克玉兹部落纽带关系构建了一个自上而下的地方民族官僚体系，割据一方。他为哈萨克基层精英踊跃参与苏维埃政治创造条件，奠定了哈萨克地方行政体制的基础，进而初步确立了当今哈萨克斯坦政治及经济精英的雏形<sup>②</sup>。

## 五 独立时期哈萨克精英的转型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成为苏联历史上唯一一位十月革命后出生的苏联领导人。1987年起戈尔巴乔夫开始推行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但两年过后经济改革仍处于初始状态，地方领导人有意延缓或不执行中央的指令，因此戈尔巴乔夫启动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戈尔巴乔夫选择哈萨克为政治改革的突破口，导致哈萨克史无前例地变为莫斯科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角斗场。1989年12月16日，哈共中央全会在首都阿拉木图召开，仅用18分钟便一致同意解除领导哈萨克24年的库纳耶夫的哈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一职。随后任命苏共中央所提名的乌里扬诺夫斯克党组织领导人科尔宾出任该职，自此莫斯科中央派与哈萨克地方派之间的关系急转直下，进而引发了动摇苏联国本的“杰勒托克桑事件”<sup>③</sup>。

“杰勒托克桑事件”演变为苏联末期一系列政治危机的导火索，引发了全国各地的抗议活动，并蔓延至整个苏联。经济改革演变为政治改革，而政治变动引发政治危机，苏联之身份认同被质疑，体制根基开始动摇<sup>④</sup>。1989年6月22日，

<sup>①</sup> Б. Аяган. Казакстан Ұлттық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IX том. Алматы: “Қазақ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сының” Бас редакциясы, 2007. Б. 469 – 470.

<sup>②</sup> М. К. Козыбаев. Казак ССР IV томдық қысқаша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I том. Алматы: “Қазақ Совет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сының” Бас редакциясы, 1984. Б. 98.

<sup>③</sup> Ә. Нысанбаев. Казакстан Ұлттық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III том. Алматы: “Қазақ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сының” Бас редакциясы, 2011. Б. 637 – 638.

<sup>④</sup> Талғат Айтбайұлы. Желтоқсан көтерілісі: Көп томдық айғақ – кітаптар I том. Алматы: “Дәуір” баспасы, 2016. Б. 3 – 20.

出生大玉兹恰甫拉西特部的纳扎尔巴耶夫出任哈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科尔宾被调职<sup>①</sup>。莫斯科此举可视为妥协之策，其目的是换取领导人对新联盟条约的支持。

由于哈萨克精英阶层人士均出身于苏共，因此思考的中心问题是俄罗斯。面对《别洛韦日协议》的签署，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虽并不欢迎这个由三个斯拉夫国家所建立的联合体，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完全支持组建一个包括自己国家在内的独联体，并没有选择与其他中亚国家一道单独建立联盟<sup>②</sup>，其原因是此时的哈萨克斯坦权力基础均处于弱势。对独立的哈萨克精英而言，首当其冲的是维护国家独立与捍卫主权，而在此过程中稳定与发展是关键，获得国际承认与继承苏联遗产是前提。

1991 年 12 月 16 日哈萨克斯坦宣布独立之后确立总统制，总统为国家元首。国家政权以宪法和法律为基础，根据立法、司法、行政三权既分立又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相互平衡的原则实现。由于哈萨克斯坦国族人口在全国人口中的比重不到 50%，加之近 500 万哈萨克人居住境外，因此政府于 1992 年 9 月 28 日在首都阿拉木图召开首届世界哈萨克大会，组建世界哈萨克协会，号召同胞回国移民的同时团结世界各地哈萨克人，一同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sup>③</sup>。海外归国的哈萨克精英主要以文化精英为主，由于自身特殊的海外教育背景与多元化身份，因此社会影响力极为有限。

为进一步巩固新生的哈萨克斯坦政权，哈政府于 1997 年将首都由阿拉木图迁至阿斯塔纳，揭开了独立之新序幕<sup>④</sup>。迁都阿斯塔纳可谓哈萨克政治精英之政治结构及权力平衡的重组，即大玉兹—中玉兹联盟。处于政权核心的大玉兹通过将国都迁至中玉兹腹地一方面实现了资源的再分配，复兴了这片曾经被高度殖民化的地区，让中玉兹在可控范围内获得壮大，重归历史之核心地位。另一方面，中玉兹以此支持承认大玉兹在哈萨克政治中的核心地位，在国家构建过程中全力配合，进而成为哈萨克官僚体系与教育领域中的中枢支柱。

迁都对独立的哈萨克斯坦而言是防止国内分裂与国外渗透的最佳良方，也是

① Б. Аяган. Казакстан Үлттық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VII том. Алматы: “Казак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сының” Бас редакциясы, 2005. Б. 5 – 7.

② Союз можно было сохранить: Белая унига – Документы и факты о политике М. С. Горбачева по реформированию и сохранению много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Издание второе. Москва, 2007. С. 486 – 487.

③ Ә. Нысанбаев. Казакстан Үлттық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III том. Алматы: “Казак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сының” Бас редакциясы, 2011. Б. 306 – 307.

④ Г. Айгбаева, С. Әлірахманов, О. Әлібеков. Астана: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Алматы: Атамұра, 2008. Б. 1 – 10.

改变全国人口结构平衡的最佳捷径，更是振兴民族精神的重要一步。对哈萨克社会而言，阿斯塔纳是政治之都，阿拉木图是经济之都，土尔克斯坦是文化之都。定都阿斯塔纳首先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角度，其次是改写历史与改变世界对草原民族的固有观点，证明哈萨克不是由殖民统治者一手打造，而是靠自身力量发展而立，不是逐水草而居，相反是推动世界文明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再次是继承阿拉什奥尔达哈萨克精英的政治发展路线，坚持融入欧洲的欧亚思想与北方联盟方针。因此国都北迁并不等同于倾向俄国，而是向欧陆靠拢。保留阿拉木图经济之都地位的目的在于维持独联体国家间的经济关系，加强哈萨克斯坦作为俄联邦与中亚四国间的特殊经贸纽带，作为全国火车头带动南方的经济社会发展。

## 结 语

综上所述，在哈萨克汗国成立至今的564年期间，哈萨克社会经历了两轮根本性的政治和社会转型，即苏维埃时期的社会主义化与独立后的资本主义化。而哈萨克精英则在此转型过程当中经历了三轮演变、两轮危机与一轮重组。每轮精英演变都是在外部环境错综复杂的情况下进行的，其核心议题与推动力是化解外部威胁与团结内部势力。源自东部的军事压力和内部的权力争斗迫使哈萨克各派封建精英向北倾斜需求援助，进而实现内部权力与区域政治势力重组。此举将哈萨克封建精英集团一分为二，即北方坚持维护自身与沙俄纽带利益的亲俄派与南方拒绝臣服于圣彼得堡的传统强硬派。结果，所有政治企图与努力都无法抗衡工业革命所创造的现代新科技，让亲俄派清楚地认识到自身的落后与启蒙的重要性，乌勒套山三杰因此问世。

殖民统治时期哈萨克地方封建精英一致认同启蒙复兴与教育立国是振兴民族和推进社会发展的基石。地方贵族子弟与利益既得权贵依靠特权资源接受现代化教育，接触了解现今思想，开始重新自我定位，推动哈萨克封建精英向资产阶级精英过度。世纪之交的哈萨克精英转型与民族构建受到俄罗斯核心政治动荡与制度之争的影响而被扼杀在摇篮里，接踵而至的意识形态大清洗则将其彻底根除，由工农阶级与知识分子阶层组成的两阶一层式哈萨克苏维埃精英得以形成直至苏联解体。国际政治环境的改变与中央权力的更替迫使苏维埃哈萨克精英重归早已被根除的资产阶级民族道路。由此可见，左右哈萨克精英选项的始终是外部因素与国家安全考量，即外部威胁。

在哈萨克的各种精英之中，政治精英永远占据着中心地位，并且发挥商业精英的作用。在苏联解体以来的哈萨克政治经济转型中，政治精英既是最主要的受益者，也是在哈萨克社会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尽管哈萨克政治精英的基础源自其所属玉兹，但部族化与区域化是最为突出的原则。东经 65 度线以西为小玉兹腹地，北纬 50 度线以北及东经 65 度线以东为中玉兹核心区，以及与此相反的是大玉兹传统势力范围，其中民族结构相对单一的州区已经实现地方哈萨克政治精英的本土化，阿斯塔纳则是 21 世纪的三大玉兹利益交汇中心。应永记哈萨克世代相传的传统分工，即“给予大玉兹马鞭，让其放牧。给予中玉兹笔，让其辩论。给予小玉兹长矛，让其抗敌”。

总体上，对哈萨克精英而言北方不是威胁，南方自始至终都是区域国家展现国力的角斗场。其缘由是，自古以来东方势力的崛起对该地区的打击是毁灭性的（例如契丹与蒙古准噶尔），而北方俄国则相对间接且与哈萨克具有高度的制度认同。哈萨克精英认为北方国家继承金帐汗国体系，思想与技术方面学习西欧，因此自然倾向于北方势力，联合共筑有利于各方的联盟体系，欧亚思想观凸显，即以欧洲国家的身份加强与亚洲国家间的合作。

在地缘政治博弈与区域再平衡方面，哈萨克精英选择在阿布赉汗式的“套环外交”基础上打造国际版的“套环外交”，在保障国家安全与可持续性发展的同时将利益最大化，提升自身的地缘政治与经济价值。对内则采取自由民主与人文主义为核心的开放政策，以和谐为贵，以稳定为重。同时，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维护法治，重组社会，创建命运共同体，构建由哈萨克斯坦人民所主导，遵循法治统一的民主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责任编辑 李中海）